

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

——以《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汉对勘为例

王继红

提要：汉译佛经文体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四字格的大量使用，即四字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这种文体特点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玄奘是中国四大译经师之一，他的译经有着强烈的追求四字格的倾向。本文运用梵汉对勘方法，将《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文原典与玄奘的译本逐句逐词对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玄奘译经中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添字、复陈、省译、互文，以及这几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玄奘 译经 四言 阿毗达磨俱舍论 梵汉对勘

一 汉译佛经的四言文体特征

自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安世高译出《明度五十校计经》始，直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年）佛经译场停顿，其间八百八十六年是佛典的翻译时代。这项走过将近千年岁月的文化转换工程，留给后世浩如烟海的汉文佛教文献。汉译佛经的总数已不可详知。根据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的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有1482部，总计约5702卷，4600万字。^①汉译佛典的载体是一种与当时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有一定距离，并令当时的读者有些陌生和不习惯的语言。这种佛教文献在文体上最为特异之处，便是四言文体的普遍运用，也就是说，汉译佛经常常是四字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②

汉灵帝时支曜翻译的《成具光明定意经》最早开始大量使用四言文体。^③在这篇经文中，大量四言句与杂言句交替使用。例如：

是时有长者子名敏见，年五百岁，时国人以为少年。敏见闻佛大会，则启二亲，乞行诣佛，观其所作。父母听行，即往见佛。稽首于地，礼竟正住。喜心兴盛，便脱身珍琦杂宝瓔珞，散于佛上。以佛神威。应时所散，化成花盖，到覆大众。人人各别，佛令就坐，为说是成具光明定意法。^④

其后，东汉康孟详的译经中，已经开始通篇以四字句为主，形成了汉译佛经的四言文体。例如：

佛说是法，五人未解，三人分卫，二人供养。为说色苦，一切众祸，皆由色欲。众好无常，人亦无住。譬如幻师，出意为化。愚者爱恋，贪而无厌。幻主观化，无染无着。所以者何？伪非真故。^⑤

*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为05JC740036。

①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1621—1896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②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8—15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③ 俞理明《佛教文献语言》，29页，（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④ 《成具光明定意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⑤ 《中本起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鸠摩罗什以后，译人们都比较重视文句的整齐，对译文句子的字数就比较重视了。由于四言文体既有鲜明的节奏感，便于传诵与记忆，又避免了押韵与骈偶对仗的繁琐，所以这种文体被译师们普遍接受，大家群起仿效，四言成为译经的最常见的形式。隋唐以后，译人们更加注意句子整齐与节奏之美，在经文中四字格以外的其他文体已经很少见了。

大乘佛教的经典常常以“*evaṃ mayā śrutam*”开篇，意为“我曾经这样听说”。*evaṃ*意为“如此，这样”；*mayā*意为“我”，充当全句的主语；*śrutam*意为“听到”，充当句中的谓语。在西晋以前，这句梵语经文几乎都被译为“闻如是”，只有个别西晋译经用了“如是我闻”。在东晋齐梁间的汉译佛经中，“*evaṃ mayā śrutam*”有的被译为“闻如是”，也有译为“我闻如是”或“如是我闻”的情况。隋唐以后，“如是我闻”已经成为了固定格式的套话。这不但是译经用语规范化的标志，也反映了四字格在译文规范方面的巨大影响。

二 汉译佛经四言文体研究概况

汉译佛经的四言文体现象很早便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以往对汉译佛经四言文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汉译佛典四言文体对汉语词汇双音化进程的影响。朱庆之（1992）认为，佛教混合汉语的高度双音化与佛经四字格特殊文体的需要有关。四言文体的最大特点是讲求节奏，二字一顿，无论四个音节由几个词组成，在语音链上大多可以切分为2+2的形式。为了满足这种四言文体的需要，汉译佛经词汇系统不但大量吸收了汉语已有的双音节词，而且还临时制造了一些双音节形式来凑足音节。许多汉语固有的单音节词都被译者临时用某种有规律可寻的方式，如“同义连文”，或在自由构词语素的帮助下创造出一个双音节形式来。而且绝大多数的外来词也被译为双音节形式（有些音译词是多音节的，但也存在双音化的趋向，如“菩提萨陀陞”往往又被译为“菩萨”），这些双音节词在佛经翻译之前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它们里有许多成员因为佛经的传诵而为人们所接受，并在口语里保留下来以后。因此，汉译佛经的四言文体在客观上成为促使汉语词汇双音化在中古时期迅速完成的外部原因。^⑥

（二）汉译佛典选择四言文体的原因。俞理明（1993）认为，汉译佛典之所以选用四字格，是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四言文体的影响。先秦时期，中原的诗歌等韵文均以四字格为常，其中尤以《诗经》影响最为深广。《诗经》在当时被当作教科书为学童所习，四言句节奏鲜明，琅琅上口，又典雅庄重，富于文采。因此，人们常常把大量运用四言句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这在汉代已经形成风气，而且年代越后，这种倾向越明显。在散文中使用四字格，即使不押韵，却仍旧句式整齐，读来很有节奏美。译经早期的经师多为胡客梵僧，在汉语的学习使用上尚有生搬硬套的嫌疑，更不要说押韵这种文字修饰功夫了。可是由于梵语原典本身句式整齐，节奏鲜明，易于传诵，所以译师们在汉译本中同样必须注意句式的整齐，比起五言、七言而言，译师更倾向于使用四字格。^⑦

（三）汉译佛典四言文体语言面貌的描写。颜洽茂（1997）认为，汉译佛典采用四字格这种整齐划一的文体，固然赞成了诵读的便利，增强了宣传的效果，但同时也带来了迥异于世俗文献的语言面貌。具体包括：其一，语词的割裂与省缩；其二，语词的增扩与添加；其三，外语词的大量引

^⑥ 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8—15页，（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

^⑦ 俞理明《佛教文献语言》，26—29页，（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进与初步整饬。^⑧

汉译佛经作为翻译作品，源头语言是梵语等古代印度或古代中亚语言，目的语言是汉语，因此，它是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欧化的产物，是汉语历史文献语言一种非自然的独特变体。所以，汉译佛经文体的研究方法也需要有区别于中土文献的独特之处，这就要求与梵文原典直接对勘方法（主要是梵汉对勘）的运用。^⑨在未对梵文原典与汉译佛经进行对勘之前，谈论汉译佛经四字格的任何情况都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以往的研究只能找出那些拗于汉语词汇语法表达方式的四字格，描写并解释此类四字格的构成方法。如果与原典对勘的话，许多表面看来合情合理的汉语句子上都是为了凑足四字格而悉心造就的。特别像玄奘这样的译经大德，更是精于此道。

季羨林认为，“（中国翻译史）第一个阶段是佛典的翻译，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从后汉到宋朝一千多年，外国和尚跟中国和尚从梵文、巴利文，还有其他本域‘胡语’里译过来的经典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因为中文同梵文文法构造非常不同，所以最初翻译的时候，当然感到很大的困难。由于实际的需要，许多译经大师都谈到翻译的标准和理论。这些理论有的非常深刻周密，一直到今天还不能不让我们叹服。但假如真想了解这些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译文同原文对一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把现存的原本拿来同译文对校。最少我们也应该把中国翻译史上几个大师像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的译文用这个方法来进行仔细研究。”^⑩

玄奘位列中国四大译经师（其余三人为鸠摩罗什、真谛和义净）之首，是佛经“新译”的创始人。玄奘大师既不赞成鸠摩罗什“不严于务利原文，而在取意”的意译文风，也反对佶屈聱牙的直译文体。他的翻译要求文和义切合原作，不得有损于原典的意旨；同时又要求文从字顺，便于读者了解。这种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最终形成了一种独创的“精严凝重”的翻译文体，而不是梵化的汉文。这从他如何译梵为汉，并将其巧妙地置于四字格式之中可见一斑。本文将玄奘所译的《阿毗达磨俱舍论》¹¹与经过印度学者 Pradhan 点校过的梵文原典¹²逐句逐词对勘，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他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来形成四言文体，借以窥见玄奘译经伟术之一斑。

三 《阿毗达磨俱舍论》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

《阿毗达磨俱舍论》（梵语 Abhidharma-kośa，下文简称《俱舍论》）是佛教说一切有部论典，为印度世亲所造。《俱舍论》在中国传译的时期较早。南朝陈天嘉四年（563），真谛在广州制旨寺译出《俱舍论偈》一卷，五九七颂，今佚。真谛后又译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二十二卷，¹³通称旧论。玄奘认为真谛所译的《俱舍论》“方言未融，时有舛错”，¹⁴“嫌古翻俱舍义多缺，然躬得梵本再译真文。”¹⁵永徽二年（651）五月，玄奘在大慈恩寺翻经院重译此论，沙门元瑜笔受，直至永徽五年七月

^⑧ 颜洽茂《佛经语言阐释》，181—213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⑨ “梵”应指一切原典语言，并非仅仅指古典梵文，还应包括其他种类的印度语文，或者还有其他的中亚古代语言。但由于“梵汉对勘”这个名称已经普遍使用，所以本文仍然沿用。

^⑩ 季羨林《“五四”谈翻译》，《翻译通报》，69页，1951年第5期。

¹¹ 《阿毗达磨俱舍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9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¹²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 of Vasubandhu*, Edited by Prof. P. Pradhan,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vol.VIII, K.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Patna, 1967.

¹³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9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¹⁴ 《俱舍论记》，《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1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¹⁵ 《宋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完毕，题名《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十卷，世称新论。

与真谛的译文相比，玄奘的译文有着更为强烈的追求四字格的倾向，综合运用种种方法来形成四言文体。例如：

独觉及声闻于一切法虽除无明，由有染污无明极不生故，不由一切种。何以故？诸余圣人，于如来不共法，及于余境，最久远时处无边差别，有无染污无明。（真谛译文）

声闻独觉 / ¹⁶虽灭诸冥，以染无知 / 毕竟未¹⁷断故，非一切种。所以者何？由于佛法 / 极远时处 / 及诸义类 / 无边差别，不染无知 / 犹未断故。（玄奘译文）

pratyeka-buddha-śrāvakā api kāmāṃ sarvatra hata-andhakārāḥ / kliṣṭa-saṃmoha-atyanta-vigamāt / na tu sarvathā / tathā hi eṣāṃ buddha-dharmeṣu ativiprakṛṣṭa-deśa-kāleṣu artheṣu ca ananta-pramedeṣu bhavati eva akliṣṭam a-jñānam / 1—9、10、11、12¹⁸

（现代汉语翻译：独觉声闻虽然在一切领域都破除了冥，但是因为他们的染污无知仍然存在，所以他们还不能通过各种方法（破除黑暗）。为什么呢？例如，另外有些人在佛法最远的时间地点，以及其他的方面还存在着不染无知。）

在玄奘的译本中，几乎都是四言文体，而真谛的译文并没有这种文体特点。又如：

释曰，生死是世间沉着处故，难可度故，故以譬泥。众生于中沉着无救接者，唯佛世尊欲怜愍度脱，授说正法手应理拔济。是人与自他利益行相应。偈曰。顶礼大师如理教。释曰。头面接足名顶礼。（真谛译文）

由彼生死 / 是诸众生 / 沉溺处故，难可出故，所以譬泥。众生于中 / 沦没无救，世尊哀愍 / 随授所应 / 正法教手 / 拔济令出。已赞佛德，次申敬礼。敬礼如是 / 如理师者。稽首接足 / 故称敬礼。诸有具前 / 自他利德。故云如是。（玄奘译文）

sasāro hi jagad-āsaṅga-sthānatvāt duruttaratvāt ca pañka-bhūtaḥ / tatra avamagnaṃ jagad a-trāṇam anukampamāno bhagavān saddharma-deśanā-hasta-pradānair yathā-bhavyam abhyuddhṛtavān iti ya evam ātma-para-hita-pratipatti-saṃpadā yuktas tasmai namaskṛtya iti śirasā praṇipatya / 1—14、15

（现代汉语翻译：因为众生沉溺于生死之中，难以逃脱，所以以“泥”来作譬喻。众生在生死中沉溺，不能获救。佛世尊怜悯他们，通过按照事实宣讲正法而施以救助之手，使众生能够拔出生死。由于佛世尊具有自利和利他的功德，所以向他敬礼，用头去膜拜佛世尊的脚。）

通过对《阿毗达磨俱舍论》梵文原典与玄奘译文进行逐句逐词对勘，我们发现，玄奘大师综合运用多种语言策略来形成四言文体。

（一）四字格添字例 玄奘大师最常使用的方法是依据梵文语法规则或佛教教义添加字词来凑足四字格，而这个被添加的字词在原典中并无对应的形式，完全是为了适应四言文体的需要。这种添字的方法在玄奘的译本中大量出现。例如：

由彼生死 / 是诸众生 / 沉溺处故 / 难可出故， / 所以譬泥。

¹⁶ “ / ” 符号是为了标示玄奘译文的四言文体特征，每四字一顿处便用“ / ”作标记，与句读无关。

¹⁷ “未”为衍字，原典中并没有与“未”对应的语言单位。《大正新修大藏经》宋元明三代的刻本中均无“未”字，可以为证。

¹⁸ “1—9、10、11、12”是梵文原典句子的编号，指的是《阿毗达磨俱舍论》第一品的9、10、11、12四句。下文的梵文原典句子编号依此类推。

sasāro hi jagad āsaṅga-sthānatvād duruttaratvāc ca paṅkabhūtaḥ/1-14

(现代汉语翻译：因为众生沉溺于生死之中，难以逃脱，所以以“泥”来作譬喻。)

在此句中，sasāro 为名词 sasāra (生死) 的单数体格形式，指示代词“彼”在原典中并无对应，玄奘大师在汉译本中增添“彼”字是为了凑足四字格。又如：

净慧眷属 / 名曰随行。

sā anucarā iti saparivārā/1-25

(现代汉语翻译：随行指净和慧的眷属。)

在原典中，这是具有典型经体特征的一句话。iti 之前为诠释性语言，其后为被诠释对象。“A iti B”，意为“B 指的是 A”。原典中的 iti 被玄奘译为“名曰”。“名”与“名曰”意思相同，用法也相同，因此在玄奘的译本中“名”与“名曰”可以自由地替换，例如：

如实无倒 / 教授减勸， / 名如理师。

yathā-artham aviparītaṃ śāsti iti yathā-artha-śāstā/1-16

(现代汉语翻译：如实地、不颠倒地教导弟子，所以称为“如理师”。)

这句原典中的 iti 被玄奘译为“名”，而不是“名曰”。如果译为“名曰”的话，即“名曰无理师”，这样就无法构成四字格了。由此可见，1-25 句译文中的“曰”为追求句式的整齐而添加的字。又如：

何法名为 / 彼所简择， / 因此传佛 / 说对法耶？

katame punas te dharmāḥ yeṣāṃ pravacaya-artham abhidharma-upadeśa/3-8

(现代汉语翻译：佛世尊为了简择哪些法而宣讲阿毗达磨呢？)

原典中的 katame 是一个特殊疑问代词，在玄奘译本中被译为“何”。在特殊疑问句中，承担疑问信息的主要语法成分是特殊疑问代词，语气词“耶”并非必须具备的成分，而且汉译佛经历来很少使用语气词，因此玄奘大师在此句中使用语气词“耶”只是为了凑足四字格。又如：

若尔，所依 / 有变碍故， / 眼识等五 / 应亦名色。

tarhi cakṣur-vijñāna-ādīnām api āśraya-rūpaṇāt rūpatva prasaṅgaḥ/13-26

(现代汉语翻译：如果这样的话，因为它们的所依可以形成障碍，那么眼识等也应该被称为色。)

原典中的复合词 cakṣur-vijñāna-ādīnām (眼一识一等)，在汉译本中被译为“眼识等五”。其中的数词“五”字在原典中并无对应的形式。在真谛译本中并未出现数词“五”，这句原典被译为“若尔，眼识等由依止变坏，亦应成色。”因此玄奘译本中添加数词“五”，将 cakṣur-vijñāna-ādi (眼一识一等) 译为“眼识等五”只是为了凑足四字格的缘故。首先，眼识属五识之一是佛门常识，所以补足“五”既收到了整齐文句的效果，又不会扭曲文义。其次，多财释复合词的用法与形容词相同，可以转指它所修饰的对象。例如多财释复合词 ṣaṭ-pada (具有六只脚的) 是形容词，可以转指它所修饰的名词，意为“具有六足的(动物)”，即“蜜蜂”。在《俱舍论》原典中，多财释复合词 cakṣur-vijñāna-ādi 意为“以眼识为首的”，当它用为名词时，转而指称“以眼识为首的(事物)”，即“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因此，玄奘在此处添加数词“五”，不但满足了构成四言文体的需要，而且非常准确地遵循了梵语语法规则。

(二) 四字格复陈例 通过对词语重复陈述的方法来凑足四字格。例如：

论曰：今欲造论， / 为显自师 / 其体尊高 / 超诸圣众， / 故先赞德， / 方申敬礼。

sāstram praṇetu-kāmaḥ svasya śāstur mähātmy-ajñāpana-arthaṃ guṇa-ākhyāna-pūrvakaṃ tasmai
namaskāram ārabhate /1-3

(现代汉语翻译：如果要造论，为了显示大师的伟大，所以先说他的功德，然后向他敬礼。)

玄奘译本中的“敬礼”对译的是原典中的 namaskāra，其后带有阳性单数业格格尾，受到动词 ārabhate 的支配。ārabhate 是动词 ā-√rabh 的现在时直陈式中间态单数第三人称形式，ā-√rabh 是个意义很虚的动词，意思是做出某种动作行为，一般可以不翻译。namaskāra 是名词性的动词(原形为 namas-kr̥)，意为敬礼，本身便表示动作行为。因为“申敬礼”就是“敬礼”，翻译与否均可，所以真谛才会将 namaskāram ārabhate 直接译作“顶礼”。玄奘把动词 ā-√rabh 的词汇意义翻译了出来，也就是说，把 ā-√rabh 译为“申”字，又将 namaskāram 译为“敬礼”，表示动作行为的“申”与“敬”重复出现，从而造成四字格“方申敬礼”。这种翻译方法不但保持了全文四言文体风格的统一，又遵从了翻译中“真”的原则。又如：

如实无倒 / 教授诫勸， / 名如理师。

yathā-arthaṃ aviparītaṃ śāsti iti yathā-artha-śāstā /1-16

(现代汉语翻译：如实地、不颠倒地教导弟子，所以称为“如理师”。)

在这句梵文原典中，śāsti 是动词 √śās 的现在时主动态直陈式单数第三人称形式，意为“教导”。玄奘大师为了将 śāsti 译为“教授诫勸”，使得双音节动词“教授”和“诫勸”同义连用，互文见义，从而巧妙地构成了四字格。

(三) 四字格省译例 通过省略翻译某些词语的方法来构成四字格。例如：

论曰：由彼对法 / 论中胜义 / 入此摄故， / 此得藏名。

sa hi śāstra-saṃjñakaḥ abhidharmaḥ etasmin arthaṭaḥ yathā-pradhānam antarbhūtaḥ iti etad
śāstram tasya kośa-sthāniyaṃ bhavati /2-2

(现代汉语翻译：这个有经论术语的阿毗达磨，根据主要意义为论所涵盖，因此，这部论取得了藏的地位。)

在原典的 2-2 句中，指示代词 etad 被玄奘译为“此”；被 etad 限定修饰的名词 śāstram (论) 在玄奘译本中并没有对译。因为在本句的前半部分已经出现了名词 śāstra，所以是否将 śāstram 翻译出来不但不会影响经文的准确性，而且凑足了四字格“此得藏名”。又如：

或此依彼， / 从彼引生。

atha vā saḥ abhidharmaḥ etasya āśraya-bhūtaḥ śāstrasya /2-3 tatas hi etad nirākṛṣṭam /2-4

(现代汉语翻译：或者对法是如此论的依止，从对法中引生此论。)

在原典的 2-4 句中，nirākṛṣṭam 是动词 nir-ā-√kr̥ṣ 的过去被动分词形式，支配句中的指示代词 etad (指代 2-2 句中出现的名词 śāstra 论)。但是，因为上文已经出现了 etad 的指代对象 (śāstra 论)，所以玄奘在此处便不再翻译代词 etad，从而构成了四字格“从彼引生”。

在上文提到的原典 1-3 句中，tasmai 是代词 tad 的阳性单数为格形式，指代句中前半部分中的 śāstur (大师，师)。真谛将 tasmai namaskāram ārabhate 译为“顶礼大师”，而玄奘却只是译为“申敬礼”，并未译出代词 tasmai。玄奘这种译法不但造成了四字格，而且由于上句中已经出 śāstur (师)，所以此处的承上省略丝毫无损翻译的准确性。

(四) 四字格互文例 通过使用同义词互文见义的方法来凑足四字格。这种方法不很多见。例如：

已赞世尊自利德满，次当赞佛利他德圆，拔众生出生死泥者。

iti ātma-hita-pratipatti-sampadā saṁstutya punar tam eva bhagavantam
para-hita-pratipatti-sampadā saṁstauti saṁsāra-paṅkād jagad ujjahāra iti/1-13

（现代汉语翻译：先是称赞了佛世尊实现了自利的功德，接下来称赞佛世尊实现利他的功德，也是本颂所说的“拔众生出生死泥”。）

在原典的 1-13 句中，sampadā 为名词 sampad 的单数具格形式，意为“圆满”，在汉译佛典中可以译为“圆满”、“圆”或“满”。sampad 在本句中，分别出现在复合词 ātma-hita-pratipatti-sampad（自一利一德一满）和 para-hita-pratipatti-sampad（他一利一德一圆）中。“圆”和“满”互文见义，不但分别凑足了四字格“自利德满”与“利他德圆”，而且没有因文害义，自然圆融。

四 余论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记载：“自前代以来所译经教，初从梵语倒写本文，次乃回之，顺同此俗，然后笔人观理文句，中间增损，多坠全言。今所翻传，都由奘意，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¹⁹从上文对玄奘译经中四言文体构成的考察可见玄奘的翻译之功，《续高僧传》中的评述绝非溢美之辞。

当然，玄奘大师的不可及处绝非本文屈指可数的例子所能尽述，尚存诸多问题有待探索。比方说，比较奘师与前代译经中生硬的四字格式之细微差异。前代译经的四言文体有些非常牵强，常常为了追求整齐划一的风格，或者为了诵读的方便而造成语词文句的割裂，而玄奘译经中绝少出现类似情况。颜洽茂（1997）指出了六朝译经中常见的四字格的各种形式，如词缀“复”、合音词的使用，以及外语词的引进与整饬等，但是这些形式在玄奘的译文中大多已不见踪影。这是由于汉语史自身发展造成的不同，抑或是译经系统内部的调整等，都是佛教汉语断代研究的重要研究项目。上述课题的完成只能赖于有关玄奘译本梵汉对勘工作的进一步展开。一切正如张建木先生在《论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一文中也强烈呼吁：“发果打算更深入更具体的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那么对勘梵汉经典的工作，无论如何非做不可。如果不做这项工作，始终好像站在大门外讲大门里的话，说了半天，也难免是捉风捕影。这个工作当然是艰巨的，而且收不到速效，但是为了中国翻译事业的百年大计着想，却也不该躲避这个麻烦。”²⁰

*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2期。

¹⁹ 《续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0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

²⁰ 张建木《论吸收古代的翻译经验》，59页，《翻译通报》，1951年第5期。